

感受“质朴”——满文《三国演义二十四卷》之评介

郭 晶

满文创制于 1599 年，1632 年清太宗皇太极下令达海对文字进行改革，至此，出现了两种满文——“无圈点满文”和“有圈点满文”。“无圈点满文”仅使用了 30 年，因此，所存文献数量不多。“有圈点满文”后被清政府尊为“国书”，得以延续，由此，今天我们所见的满文古籍均为“有圈点满文”古籍。

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记载中，满文文献没有藏文文献和彝文文献那样悠久的历史、没有东巴文文献那样令人难解的神秘、也没有其他文字文献那样精美的装帧和插图，但是在 2008 年第一次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中，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满文古籍《三国演义二十四卷》，以其质朴的本色，向我们展示出满文古籍不一样的风采。

满文古籍《三国演义二十四卷》是清顺治七年（1650）大学士祁充格遵摄政王多尔袞谕旨，组织一批文官翻译校对，刊印出版的，全书 24 册，分装 6 函，匡高 29.4 厘米，宽 21 厘米，半叶九行，白口，四周双边，包背装。

简单的背景资料却涵盖了满文古籍很多特点。首先，从古籍年代来说，刊刻时期较早，很多历史资料证实这部古籍是清入关后翻译的第一部汉文文学作品，虽然当时翻译可能是为了其中的行军布阵之法。在很多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中，翻译汉文经典是最为常见的现象，但是，不同民族对于博大精深汉文化的吸收确是千差万别的，在藏文古籍和西夏文古籍中，更为多见的，是对汉文经典佛经的翻译；在彝文古籍和水文古籍等南方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中，却是多见于对汉文化中宗教信仰和祭祀习惯的吸收、创造和利用。清政府却对整个中原文化都情有独钟，

不仅翻译出版了很多文学作品，诸如：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本《金瓶梅》、满汉合璧的刻本《西厢记》和《三国志》等等，而且分门别类地翻译了更多的汉文经典之作，例如：四书五经——清顺治年间听松楼的刻本《诗经》；启蒙读物——雍正二年（1724）翻译的《三字经》；编纂满文工具书——满汉合璧的《御制增订清文鉴》等等。这个积极吸取他族之经典，雕琢本族之特色的少数民族，在翻译经典上做足了功夫，其译作数量远远超过了其他异邦民族的译作数量，这就是满文古籍的第一个特点——译作数量多。

这部满文《三国演义二十四卷》在第一批特展的展场中，是唯一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语言翻译的文学作品，却仅仅是这个民族译作中的一个缩影，而且也只能将其作为文学译作中的一个缩影，在这部古籍的身后堆积着包罗万象的译作，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民族兼容并包的治学态度，也为我们保留了硕果累累的经典译作。

其次，从古籍成书方式来说，满文《三国演义二十四卷》是政府组织实施刻印的，属于官方行为，即官刻。官刻和私刻，在汉文古籍中，是不足为奇的现象，但是对于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来说，却不属于常见现象。很多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传承方式是家族传抄保持延续，一旦完成新的抄本，立马焚毁底本。因此，很多少数民族文字古籍难以断定年代，只能通过文字演变特点和特殊词汇的产生时间，来模糊断定传抄的年代。由于清政府对官刻图书发展事业的重视，才得以将众多著录着清晰、准确、可考版本年代的满文古籍留存于世，这也就是满文古籍的第二个特点。

清顺治七年（1650）内府刻本《三国演义二十四卷》，同样也是第一次特展展场中，唯一一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官刻文献，同时最清晰详实的版本年代，为后人对满文古籍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年代信息，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中，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最后，从古籍装帧形式来说，满文《三国演义二十四卷》包背装，半叶九行，白口，四周双边，有“满蒙汉高等学堂监督关防”等印。这些简单的描述常见于汉文古籍的著录中，而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中，包背装、卷轴装、册页装和蝴蝶装等装帧形式形式是不多见的，类似“黑白口、栏线、小字双行”等传统内容更是不常见，不同民族文字古籍的装帧形式和著录方式都各具特色，但是唯独只有满文古籍更多地保留了汉文古籍的这些信息，从装帧形式到著录内容，都毫无遗漏地继承下来。这就是满文古籍的第三个特点——满文古籍极具汉文古籍的特色装帧形式和著录方式。

在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入选的十一部满文古籍中，十部古籍都继承了汉文古籍的传统装帧形式，只有一部古籍采用了佛经的梵夹装形式。满文《三国演义二十四卷》是唯一一部以包背装装帧形式出现在第一次特展展场中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绚烂夺目的装帧形式来说，真可谓，洗尽铅华之后的返璞归真，自然而亲切、简洁而真实！

满文《三国演义二十四卷》以其平凡的外表、简洁的风骨、平实的内容，在整个展场中，绽放出夺目的光彩，令人流连忘返！这部古籍在纷繁复杂的几百年尘世中，一直固守着那个民族曾经灿烂纯真的文化，也一直固守着古籍保护人士那份执着的信念！